

一大回忆录

知 识 出 版 社

一大回忆录

本社编

6571852

知识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李达、包惠僧、刘仁静、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和马林等十人的回忆文字或谈话十一篇，是记述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实的第一手材料。除参加者本人回忆文字外，还辑录了党史考证论文四篇，根据确凿的史料，对一大会期、参加人数和讨论议题作了令人信服的论断。书中还附录了一大通过的纲领等文件。全书有半数材料过去国内未发表过。目前印行的一大资料大都属于汇编性质，着重详尽，卷帙浩繁，适合研究人员检索；本书选材则较为精审，篇幅简短，便于一般读者阅读。

一 大 回 忆 录

本 社 编

知 识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安定门内外馆东街甲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19,000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2,000

书号：11214·2 定价：0.45元

· 内 部 发 行 ·

出版说明

《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发表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两篇回忆和一篇建党史料以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各地读者纷纷来信希望多发表这类回忆文章。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党史的需要，我们特在原有三篇的基础上，又收集了一批有关一大的回忆文章，出版《一大回忆录》一书。

收入本书的有一大出席者发表的回忆或谈话共十一篇。在一大文献未能在国内保存下来的情况下，这些资料是我们研究一大的宝贵史料。但由于当事人是在事隔多年以后追忆的，加之各人的经历、观点不同，回忆中不免存在互有出入的地方，请读者注意分析鉴别。

本书还收入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以及胡华、萧效钦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史料》、邵维正的《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和《一大议题初探》，供读者参考。

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工作正在蓬勃开展，但目前编印的一大资料大都是供研究人员使用的史料汇编，不但篇幅巨大，而且同一人前后几篇中说法不一致地方，也未加订正。本书吸取了近年党史研究的成果，对一大会期、参加人数和讨论议题，都作了必要的考订整理，适合一般读者阅读。

目 录

出版说明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毛泽东	1
与尼姆·威尔斯的谈话·····	董必武	3
回忆党的一大·····	陈潭秋	7

* * *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

经过的回忆·····	李 达	12
党的一大前后·····	包惠僧	24
一大琐忆·····	刘仁静	45

* *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张国焘	53
扶桑笈影溯当年·····	周佛海	66
我与共产党·····	陈公博	73
赴华回忆·····	马 林	81
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	马 林	91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104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110
中国共产党建党史料·····	胡 华 萧效钦	115
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附：七一的由来·····	邵维正	130
一大议题初探·····	邵维正	159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毛泽东

1921年5月，我到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袖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的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那年10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

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1927年被害)。王尽美和邓恩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摘自斯诺：《西行漫记》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1979年12月第一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与尼姆·威尔斯的谈话

董 必 武

编者按：这是美国作家尼姆·威尔斯 1937 年访问陕甘宁边区时同董必武谈话的节录。全文见尼姆·威尔斯著《续西行漫记》。

直到这时，在中国只有很少几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后来，1920 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回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组织党的湖北支部。这是 1921 年 9 月才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 1921 年 5 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 1921 年 7 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每个省派出两个代表。从日本回国的学生派一个代表——周佛海。他后来叛变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大约 1935 年在红军中工作时与瞿秋白同时被杀）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刘仁静现在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上

海派李汉俊和李达。李汉俊 1927 年在汉口被杀。李达现在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成了一个大学教授。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变成为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也成了国民党官僚——内政部长。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后来两个人都被杀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一个来自荷兰——我们称中国名字叫马林。（原书注：“马林”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第一个代表）另一个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为会议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所有关于这次会的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我们已经没有一点这第一个党的文件了。我记得辩论的一个观点是党员可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一些人反对这样做。通过的决议是一个“关门”政策，保持党员的秘密和“纯洁”。我们还决定党员不能参加任何别的政党，象孙中山的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党。我记得会上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包括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汉俊等人。

这几个党的“先辈”除我以外是些老同盟会员，例如陈独秀、戴季陶和沈玄庐。

那时武汉中学是湖北共产党的中心。党支部由我们五个人组成的，不久以后，十个最进步的学生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湖北建立党支部的五个人中的三个人后来离开了党。一个变成了自由主义者，一个现在南京，一个现在汉口当律师。只有陈潭秋和我保持信仰。我不知道陈潭秋怎样了，但是我想他还活着。

武汉不久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共产主义的堡垒。作为一个

宣传中心，那里计划开一个外国语学校，一个俄国共产党员叫马迈耶夫和他的妻子来到武汉任教，但是计划未能实现，所以他们又返回了上海。

在1921年夏天，陈独秀亲自到武汉并在一个基督教学校文华大学作了一次讲演。他恰巧遇到一个同大学有联系的工人，这个工人受影响参加了湖北(共产)党，并通过他同棉厂的一些工人联系。这样，党的发展走向工业。

那时武汉有一个激进青年团体，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乌托邦的和半无政府主义的，他们的兴趣在于进行新农村运动。这个中心在中华学院，组织了一个利群书社。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个卓越的青年叫恽代英。他在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是中国的一个最好的青年领袖之一。这个“新农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不久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并有许多人参加了共产党。恽代英后来在四川参加了党，1932年被杀(1931年4月29日英勇就义——编者注)。

我们湖北第一次代表大会，有三十个代表。我们派学生到农村去建立组织和进行宣传，他们的工作对1923年平汉铁路大罢工影响很大。

我的第二个工作是去四川恢复我们的一些老策略，争取军事力量参加革命。那时四川的主要军队有反军阀的倾向，所以我到那里去发展这个运动，我花了一年时间做这个工作，后来党命令我回湖北。也是因为武汉中学急需资金，要我回来募集资金给学校。

我回来以后，我喜欢考虑怎样使党的工作进步，一方面在学校，一方面在工厂都有进展。那时，共产党工人运动的中心在平汉铁路工人，我们有一个劳动书记部在长辛店。

我父亲在武昌教书，病了。我送他回家，回去不久死了。当我回到武汉时，1923年平汉铁路罢工爆发了。张国焘曾反对罢工。

我所以仍然能够留在武汉，因为我是有名的国民党员，不是共产党员。直到1925~1927年大革命以前，连我家也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



回忆党的一大

陈 潭 秋

1921年7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他们都下榻于这学校的楼上。在学校的楼下，除了厨师兼校役以外，谁也没有，因为学生和教员都放了暑假。一个熟识的校役则被请为大家每日作饭。另外，他的任务是注意不放一个生人进来。假使不是由于有认识的人向厨师解释，那他会根本不知这九个客人是谁，因为他不懂他们的土话，他们讲的都不是上海话。有的讲湖南话，有的讲湖北话，而有些则讲北京话。

这批新到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他们到上海来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在这九人里面有湖南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董必武和我；山东济南的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那时，王、邓两人是非常活泼的青年，王后来死了——非常严重的工作侵蚀了他，邓则被捕后死在狱中。北京的代表是刘仁静，后来成为托洛茨基派，被开除了党籍。广东的代表是包惠僧。代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及侨民的是周佛海，他

不久在广东进行反党活动，被党开除。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除了上面所指出的九人以外，还有代表北京的张国焘，代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李汉俊在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因他拥护右派机会主义的观点，并与北洋军阀有往来；在武汉政府叛变后，他被安徽军阀枪毙。李达则在五卅后退出了党。广东第二个代表是陈公博，他在陈炯明暴动时，帮助了陈反对孙中山。陈公博受过党的屡次警告，终被开除了党籍，后来很快成为有名的国民党活动分子。

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手下做广东的教育厅长。在第一次党代会后，陈独秀参加中共领导很久，在1927年革命严重时期，他坚持投降政策，出卖了革命事业。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7月底开的。大会的组织非常简单。张国焘被选为主席，秘书为毛泽东和周佛海。大会开幕就在上面所说的学校内举行的，而大会本身的工作，则在李汉俊的家里进行。大会共开了四天，讨论以下的问题：目前政治状况，党的基本任务，党章和组织问题。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发生了争论，一部分是对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问题。一方面以李汉俊为首表示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尚很幼稚，不了解马克思的思想，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在这一基础上，李汉俊认为无需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资产阶级民主。他认为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亦可以公开地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用不着组织职工会，最好还是用一切力量去发展学生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李汉俊主张首先应真正地组织知识分子，用马克思理论把他们武装起来，然后，当知识

分子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时，才能有力地组织和教育工人。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党，用不到有纪律的战斗的党，主张党应是联合知识分子的、公开的组织和和平的政党，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由此他得出结论：凡承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都可为党员。参加党的某一组织和在里面进行实际工作，他认为是不必要的。当时拥护李汉俊的观点的，还有李达和陈公博。

另外是一种极“左”的观点。以刘仁静为首，认为无产阶级的专政是党斗争的直接目标，反对任何公开形式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都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他认为应拒绝知识分子入党。同情他的观点的有包惠僧。

大会大部分的代表都反对这两个不正确的观点，终于通过了一个共同方针，即党的基本任务是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在规定目前时期斗争的策略时，指出党不仅不拒绝，而相反，必须积极号召无产阶级参加和领导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通过了方针，要求党成为有战斗能力及有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职工运动为共产党工作的中心任务。关于工作能否采取公开形式的问题，则指出，如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则党应当利用它。至于党的组织原则和接受新党员的条件，则采取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

大会通过了这些方针。最后通过党章，放在会议的第四日的议事日程上。但这天吃过晚饭后，大会的参加者，晚八点集合于李汉俊家中，主席宣布大会继续工作时，在隔壁房间内发现了一个穿长褂的可疑人物，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找社联组织的主席王某，后又说找错了，很快溜了出去。对的，相距李汉俊房子三幢房子的地方，有一个社联的组织。但大家都知

道这一组织并没有主席，更没有姓王的人。因此我们认为这人非常可疑，大家很快收集文件，隐藏了起来。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真的没有经过十分钟，李汉俊的家中即来了九个侦探和警察搜查房子。除了公开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外，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因此，没有人被捕。

大家因此不得不找寻宿处，回到女子学校，我们又不能，因为估计侦探是从女子学校追踪探知我们的。

在开始时，我们计算七天完结大会工作，但是因此不得不缩短到五天。同时在上海找不到继续进行大会工作的适当地点。后来一度决定到杭州西湖去。但是在出发前，又作出判断，西湖不是适当地点，因为那里游人太多。随后，决定改在嘉兴的南湖举行。这里虽有游人，但较少。到那里后，我们即租了一只大船，买了食物、酒，好象游人一样，在湖上的船中进行大会的工作。

这是大会的最后一天。李汉俊和陈公博没有出席，因为在搜查后，他们后面就有人钉梢了。那天早上是阴天，在八点钟后，就有许多游人，因此使我们的工作有了困难，但在十点钟时，下起小雨来，游人都散了，因此保证能安心工作。我们一直讨论到晚上十一点，除了最后通过党章外，我们还讨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问题，和设立中共临时中央局的问题。然后选举中央局的委员。关于对孙中山的态度问题，引起了不大的争论。包惠僧认为共产党与孙中山是代表两个不同的阶级，不应有任何的妥协。因此对孙中山应和对北洋军阀一样看待，甚至要把他看得更坏一些，因为孙中山的宣传，容易使群众彷徨。这一主张受到了大会代表的反对。大会对这问题通过了以下的方针：一般地说，对孙文学说应有批评地、有区别地对待，

但他的个别的、实际上是进步的行动应予以拥护，可采取党外形式和他合作。通过了这一原则，可以说为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石，同时也是发展反军阀和反帝运动的基础。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前，除了在日本、法国的留学生、侨民中的共产主义小组外，只是在上海、广东、长沙、武汉和济南有共产主义小组，在南京、成都和杭州只有个别的共产主义者。那时共产党员一共不过几十人。因此决定不组织正式的中央。为了和当时存在的个别支部发生联系，建立党的中央局，党的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

在临时中央局里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委员，候补委员为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

这样即结束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伟大的领导中国革命和引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中国共产党。

（《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 第一次、第二次代表 大会经过的回忆

李 达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五四运动后，由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提高，由于马列主义的介绍、研究与宣传的相当普遍，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先导，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思想准备与国际声援等客观与主观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1920年4月，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魏金斯基（他的夫人同行）来到北京。据他说：“东方局曾接到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过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所以派他到中国来看看。”（他曾经在美国做工多年，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到北京以后，首先访问了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许多进步人士，举行过几次座谈会，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因为苏俄政府第一次对中国的宣言（即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刚才传到中国，中国很多社会团体都表示热烈欢迎，所以一听到苏俄人来到北京，大家感到特别高兴。魏金斯基在几次座谈会上，报告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外政策。当时李大钊同志等对